

一 夷务——洋务——洋务运动

1. 夷务、洋务

——内涵泛化的新事务

“何物岛夷横割地，更索黄金要岁币”。这是晚清诗人黄遵宪描写中国近代遭受外国侵略的诗句。中国人对于“岛夷”都怀着强烈的民族义愤，没有觉得对侵略者以贱词相称有何不当。

对外国或本国少数民族以贱词相称，并非中国独有。但是，在中国以中央政权为中心而用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称呼周边国家与国内少数民族，由来久远，确有妄自尊大的谬误。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设在长安稷街的“蛮夷邸”，就是专供中国境外民族和国内少数民族居住的宅邸。东汉时，承袭旧制，在洛阳特定街区建造蛮夷邸，外邦人可以长久居住。

后来，鲜卑贵族建立北魏政权，在京城洛阳南郊建立了供“夷人”临时居住的四所宾馆和长期定居的四个居留区。四馆，又名“四夷馆”。“吴人”所居叫金陵馆，“北夷”住地称燕然馆，“东夷”为扶桑馆，“西夷”名崦嵫馆。当时的“吴人”是指在华东建立南朝的汉人。唐代，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广州供大食和波斯人居住的住所叫蕃坊。黄巢农民起义后，蕃坊衰落。到宋代，因对外贸易恢复，蕃坊再度兴盛，一直延续到元朝。明初厉行海禁政策，蕃坊逐渐消失。清代在广州设商馆，又称夷馆、蕃馆。

在漫长历史年代里，中国始终是东西惟一的大国，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比周边邻邦发达，形成一个封闭的中心。这种状况使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头脑中滋生起天朝上国的优越感。对于中国以外的广阔世界茫然无知，只视为蛮荒领域，把外邦人统称为化外之民。所以清朝把管理邻邦事务、交涉的机构称为“理蕃院”。

夷务泛指与外夷相关的一切事务，最初是从传统的优越感和无知偏见产生的。后来，在遭受外国侵略者船坚炮利的沉重打击，中国人蒙受了沉重的战争灾害和割地、赔款、丧失主权的凌辱，人们才义愤地斥侵略者为夷，把与

外国侵略者的一切事务统称作夷务。传统的优越感、无知偏见和民族义愤搅在了一起。

洋务一词要比夷务的贬义色彩淡些，但当初也绝非敬语，这与后来的崇洋心态迥然不同。夷务、洋务的广泛使用从鸦片战争前后开始，最初，这两个词是并用的。1832年英国商人林赛等到上海谋求通商，上海道台在复文中便称他们是“夷国”的“夷人”，曾引起他们的不满。

鸦片战争爆发前夕，虽然中国官民多以夷人、夷务来称道外人和对外交涉的一切事务，但1839年7月至1840年7月，御史骆秉章、陆应穀等人的奏折说到对外交涉事务都用了“洋务”这个词。1858年5月在籍侍郎罗淳行为对外的称谓问题特地上奏，强调应称夷务，而不要称洋务。

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所订《中英天津条约》规定，日后中外文书往来，对外人不得以夷相称。从此，正式外交文书中的用词才以“洋”代“夷”、以“洋务”代替“夷务”。但是，由于外国侵略者依仗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国门，迫使清政府与他们订立不平等条约，割占中国领土，侵夺主权，索取赔款，残杀百姓，焚毁文物，罪行累累，激发了中国人的仇

恨。因此，官方文书虽已不再用贱称，但官民的著述和民间俚语，沿用夷、番鬼、红毛鬼等蔑称依旧很多。

近代的夷务、洋务主要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中国后引发的事务，对于封建主义的中国来说，都是内涵泛化的新事务。新事务的核心是抵御侵略、奋发图强。为此，就要“师夷长技以制夷”，练兵、制器，使中国也拥有坚船利炮。这就是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人萌发的自强观。所以从广义上说，夷务、洋务是泛指处理一切涉及西方和俄国（日本另有专门词汇）的事务，从狭义上说只是指练兵之法、制器之艺，也就是学习和采用西方练兵方法和科学技术。如果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条约规定清政府的外交文书不得再用夷和夷务字样为根据，那么，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开始的自强运动，也就可以说是洋务运动。因为从那时起，总理衙门和疆臣大吏、老师硕儒多次以自强为中心的辩论，都属于洋务范围。有人说19世纪60年代前，大体上把涉外事务称作夷务，70~80年代称为洋务。由前引黄遵宪诗文可以证明，这种称谓的年代划分并不确切，只是一个粗略的界定。

办洋务，论洋务，当时无论赞成或反对的

人都有一个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

2. 洋务运动与正名之争

无论是自强运动还是洋务运动都是后人概括的特定词汇。当时的疆臣大吏、老师硕儒在奏折、条陈、著述、函电中议论自强、洋务的文字汗牛充栋，但都没有把这两个词与“运动”联系起来。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梁启超 1898 年从变法的角度把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发展分作四个阶段，其中前两阶段的内容略与本书所讲的洋务纲领的萌发和洋务运动的兴起、发展相当。他认为 1840~1860 年为第一阶段，魏源著《海国图志》、林则徐译西书，都可说是变法的萌芽阶段。但这 20 年间，叠经大患，清政府却“无毫厘变法之说”。1861 年后的 20 年间是第二阶段，他列举了清政府创办制造局，制器译书，设方言馆，建招商局，派学生出洋留学，以及委派美国人蒲安臣为大使，访问欧美国家等，认定这一切便是变法的“筚路开山”。他虽然列举了洋务活动的许多内容，却不用洋务来概括这一阶段的特点，而把这些活动视为变法运动的先导。他也用过“洋务”、“谈洋务者”之类的词汇，却没

有提出洋务运动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对于洋务活动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没有足够的重视，他把主持洋务活动的李鸿章的业绩只概括为“军事”和“商务”。军事业绩，甲午战争失败后，30年蓄养布划，“烟消云散”。商务方面，“亦无一成效可言”。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国内的一般历史著作对于洋务活动的议论，逐渐由承袭梁说，开始向社会经济效益方面拓展。

“洋务运动”这个词的出现，据史家考证，是1938年何干之在《中国早期启蒙运动史》一书中最先提出的。他说：“鸦片战争以来，由曾、李的洋务运动，康、梁的维新运动，辛亥反正的三民政策，五四时代的文化运动，国民革命时代及其以后的新社会科学运动等，都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的经济机构、政治形态与中国资本主义，互相适应的启蒙运动。”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作者虽然也从政治上把“洋务运动”视为近代中国“最初的思想运动”，肯定它“使一向崇拜圣帝明王的人的思维，发生激烈的变化”，“对妄自尊大的天朝，起了一个重新估定的观念”。但作者认为洋务运动是封建上层分子目击中国民族危机所提出

的改良政策，是用对内的改革以达到对外的独立，具有爱国主义性质。作者还肯定了洋务运动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作用。

何干之的论断，可以说是代表中国早期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意欲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审视中国国情所产生的一种政治历史观。他们认为要了解中国社会性质，只有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剖析，才能引发出正确的思想、观念、派别，以及各派代表在中国近代社会政治变革中的作用。

两年后，即 1940 年，史学家吕振羽在《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中，也采用了洋务运动这个词，并说：“洋务运动在本质上并非革命，而是封建阶级的一种自救运动。”后来，史学家范文澜在延安编写的《中国近代史》（上册），也有类似的阐述。而吕振羽所说“洋务运动在西学为用方面，在学习和设立资本主义性质的事业方面，客观上是进步的。而在中学为体，在维护封建统治方面，则是保守的、反动的”，更为后来撰写中国近代史的许多作者采纳。

这样，清朝同治初年所出现的洋务活动，以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海军覆灭，战争失败为下限，史学界便约定俗成地称为洋务运动。由

此又产生了洋务派、顽固派等概念。

事实上，现在中国近代史上所说的洋务运动是指同治初年清政府确定了“灭发捻为先”，制外敌次之的国策之后，在中央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随后又在地方设置了南、北洋通商大臣等机构和官职；对外不仅同意外使驻京，而且出现了借洋兵助剿人民起义，以及与之相应的一系列政策。在这种新形势下所发生的大力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办厂开矿，从造船铸炮的军用工业，逐渐向民用工业、交通运输、电讯邮政、办学堂、译西书倡留学等方面扩展，以及借助西法练兵，筹海防，建舰队。这一切日益繁纷的新事务、新举措，其核心是引进先进科学技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实现早期的工业化。这也就是洋务派所标榜的求强、求富的内容。洋务运动的下限定在 1895 年北洋舰队覆灭和甲午战争的失败，正好显示洋务运动不能达到求强求富的目标。所以，相当长一段时间，所有中国近代史著述几乎都一致认为北洋舰队覆灭标志着洋务运动“彻底破产”、“完全失败”。诚然，用北洋舰队覆灭、甲午战争失败论证洋务官僚的“求强”、“求富”愿望破灭是说得通的。但是，如果以舰队覆灭、战争失败来论证洋务官僚所主持、倡导的早期工业化运动

“彻底破产”、“完全失败”，就难以说通。这不仅与甲午战争失败后，洋务工矿、交通、电讯教育、练兵等事业和民间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仍在继续发展的事实不符，也很难与清政府最后 10 多年逐渐奖励工商业的政策相衔接。

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在中国近代经济学和历史学领域，就有人主张重新评价洋务运动。也有人认为自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洋务运动本有不同称谓，如同光新政、洋务措施、洋务历史、洋务活动、自强运动、图强御侮运动等。而就洋务运动的本质而言，它是以近代工业化运动为主体的中国早期近代化运动，应当正名。这种把洋务运动正名为早期近代化运动的主张，就是要对长期来约定俗成的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重新加以评定，这是很必要的。

二 “师夷长技以制夷”

—— 洋务纲领的萌芽

1. 乾隆帝行宫召见英国“贡使”

1840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清政府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这是中国人永志不忘的。其实，英国侵华图谋早在此役之前约50年，即1793年，就已流露出来了。这一年英王派遣一个由马戛尔尼率领的135人的庞大使团，配备步、炮官兵650人，大炮64门，来到中国，旨在向中国提出扩大对华通商的一系列要求。这一年正好是乾隆帝陶醉于完成“十全武功”，准备补庆八十大寿之年。当时英王对于这个远东文明古国也还怀有神秘敬慕之感，因此，派来的使团不仅扬言来华是为清朝大皇帝祝寿，而且在国书中还充满着赞扬文字，经过译文润色，竟有“著来向化输诚”的谦词。乾隆帝在

这一年既完成了“十全武功”，又建成了气势恢宏的承德行宫，正拟庆贺功业大就，并以清朝的德威怀柔远人，因此，同意马戛尔尼率 100 人到行宫参与祝寿大典，沿路有清兵高举“贡使”大旗开道。

1793 年 9 月 14 日乾隆在热河行宫万树园接见了英使及随员。接见前虽然出现了行跪拜礼的争执，但最后乾隆同意以他们在英国晋见英王的单腿跪见相通融。乾隆召见时英使敬献了礼品，随后便接受赐宴款待，被邀请看戏，一切活动都限定在对待“贡使”范围之内。21 日英使被送返北京。马戛尔尼没有机会把他们扩大对华通商的种种要求向乾隆陈说，便在北京开具说帖，向清政府提出了七项要求：允许英国在珠山（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贸易；按俄商前例，允英商在北京设一行栈买卖货物；于珠山附近划一未设防小岛，归英商使用，以便存放货物并允英人居住；在广州附近也应允英商有此权利，自由往来；英国商货自澳门运广州，赐予免税。不能尽免，请按乾隆四十七年（1782）税率，从实减税；英商按中国税则交税后，不再另行征税；允许自由传教。

陶醉在四方来朝的欢庆气氛中的乾隆皇帝对于“贡臣”竟敢提出这么多无理要求，斥为

“妄行干渎”，立即断然拒绝。乾隆在复英使诏书中以天朝皇帝的宽恕口吻表示：“念尔国僻居荒远，间离重瀛，不谙天朝体制，特命大臣向使臣详加开导，遣令回国。”

这是 18 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工业强国、海上霸王的使臣与东方封建专制主义古国、处于盛世的明君乾隆皇帝最初相遇的结局。从表面看清政府确是显示了天朝无所不有的豪华和专制主义皇帝的赫赫威仪。而英国使团却在“贡使”的旗号下，一无所获地被遣送出中国。但是，庞大的英国使团作为侵华先驱，他们亲自考察了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情况。从北京皇宫的巍峨、热河行宫的豪华辉煌和中国广大农村的贫瘠落后、人民生活水平的艰苦相对照，得出了中国是一个停滞不前社会的结论。他们从护卫使团的清朝兵勇的集结和装备，认定中国军队没有受过军事教育，缺乏近代的基本训练，所使用的武器限于弓箭刀矛，在新式火器的进攻下，不堪一击。他们对于中国的土地辽阔、资源富饶、人口众多有了实际的了解。这一切都为英国政府进一步入侵中国提供了具体的资料。

从这次互送礼品的内容也应引起清朝当政者的警觉。英使带来的礼物共 19 件，第一件布

蜡尼大利翁大架一座，分 15 箱装载，是一种大型天象仪，设置的日、月、星辰和地球，都能自行转动，效法天地星宿运转，十分相似。另附望远镜，能观望天上遥远的小星。第二件座钟一架，也是天文仪器，能解说地球与日、月、星辰一同运动的原理。第三、四件天球全图、地球全图，是观察天体和地球山川河流、海洋岛屿的工具。第五、六件是探测气象的用具。此外还有车子、长短自来火枪、刀剑、铜炮、西瓜炮、大小金银船缩小的模型。至于家用器具、手工制品、钢铁制品、转椅等，多以实用、高效为特色。

透过这些礼品充分显示了英国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在天文、气象、航海、造船、武器制造方面的进步和实力。当清朝皇帝和疆臣大吏还沉湎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蔑视英国僻居荒远未承教化之时，这个大西洋上的岛国早在 16 世纪末至 18 世纪中叶的长期征战中，先后打败西班牙、荷兰、法国，夺取了海上霸权，成为当时欧洲的第一强国，17 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和 18 世纪兴起的工业革命，更使英国的综合国力空前增强。由于蒸汽机的发明并在纺织机上推广，纺纱效率由手工单一操作提高到 300~400 纱锭的机械操作。自动织布机的投产，使

织布效率提高 40 倍。纺织业的革命推动了漂、染等化工行业和机器制造业的改革，进而促进了机械装卸、交通运输、开矿、冶金，以及与之相应的力学、化学、原料配置、新原料开发、加工技术的发展和提高。于是，英国的棉纺织业以其廉价的巨额产量，倾销海外，很快便击败了具有实力的印度棉纺织业。纺织和机械工业的发展又推进了生铁和煤炭产量的迅速增长。18 世纪末，便出现了第一艘铁甲船。

英国把侵略触角伸向中国是早有图谋的。1787 年英王就曾派专使来华交涉通商事务，只是由于英使中途病死，未能如愿。6 年后便有了马戛尔尼率领庞大使团来华的行动。这时，英国不仅要求割占岛屿，从东南到天津准其自由贸易，减免关税，自由传教，而且，随来的副使斯当东已由英王定为首任驻华公使，准备在这次借向乾隆祝寿之机，取得扩大对华贸易的有利条件后，即将他留驻北京。试想马戛尔尼等空手返国，正在向东方大力扩张的大英帝国岂能就此罢休？而自诩为天朝明君的乾隆和他的那批臣僚，靠对英王和英使发表训诲言词，绝不能阻挡得住侵略者的脚步！可悲的是，由于闭塞无知，愚昧狂妄，清朝皇帝和疆臣大吏，对待英国使团送来的礼品，不是不屑一顾，就

是斥为奇技淫巧。一些堪资借鉴的科技成果，白白被废弃了。

反观清政府赐予英王和英使的礼物，总计共 80 余种、200 余件，主要是瓷器、漆器、玉器、文房四宝以及画绢、洒金五色字绢、五色笺纸、高丽纸。另有加赏的礼物 40 种也有 200 多件，多系绸缎、宫扇、折扇。还有加赏正、副使的礼物，与上述物件雷同。其中有不少堪称文物和珍贵艺术品，具有很高的欣赏和收藏价值。其用意是要以这些礼物显示文明古国的历史成就和现实的富裕、气派，以达到“怀柔远人”的目的。

这些礼物确实也能激起外国人对文明古国悠久历史文化的敬慕、崇拜，但无助于抵抗侵略。而乾隆皇帝的倨傲则半是继承了夷夏之辨观念的传统，半是由于陶醉于自己帝王功业的“辉煌”。乾隆帝对英国人要求扩大贸易的答复是：“天朝无所不有”，“并无更需尔国制办”；对于那些显示科技成就的礼品，不屑细顾，只说“从不贵奇巧”。官吏和士人也沉迷在天朝首四夷的传统偏见中，他们无视科学技术的发展，满足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丰裕”，对日益强大的侵略者所表现的昏聩与傲慢，不得不由后人来付出沉重的代价。

2.50 年间英国不断侵扰

英使马戛尔尼所率庞大使团沿运河南下，经浙江、江西、广东，于 1794 年 1 月返回英国。但是，这个工业迅速发展，以开辟世界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为目标的头号强国，是绝不会中止对中国的觊觎的。随着国力日益增强，直到悍然对华发动鸦片战争，50 年间，英国曾对中国不断侵扰。

19 世纪，英国进入蒸汽机时代，生铁产量由初期的 25 万余吨，到鸦片战争前夕的 1835 年增至 100 万吨。出口量近 20 万吨。19 世纪 20 年代，英国输入印度的棉纱达 300 万磅，棉布 4500 万码，使印度的棉纺织业完全破产。工业革命造就的庞大生产力，使原材料的需求急剧增长，开拓产品市场也异常迫切。这一切都促进英国加速向海外发展。1807 年美国人密尔顿发明汽船，1814 年英国人史蒂芬逊发明蒸汽机车，1825 年英国建成了第一条铁路。交通运输业的长足进步，为海外发展提供了便利。印度成为英国向远东发展的重要据点。当时英国的工业制品、印度的鸦片、中国的白银，形成损害中国的三角贸易，使英国获取了巨大利益。

1834 年原先垄断性的东印度公司被取消了对华贸易特权。英国继续进行走私性的鸦片贸易，积极鼓吹发动侵华战争。

事实上，从 18 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兵船已经在中国东南沿海不断侵扰。1742 年英舰在澳门劫夺西班牙商船，带入广东省河，经两广总督派人前往质问，英舰释放俘虏 299 名。1744 年英舰 4 艘在广东洋面拦截法国商船。1781 年英舰在黄埔擅捕荷兰船只。广东巡抚曾向英舰警告说：倘不遵天朝规矩，“总要按照大皇帝敕令，连大班人等同本犯一并严拿，分别从重究治，不稍宽贷”。

1796 年，嘉庆帝即位。1799 年、1802 年、1808 年英国舰队多次侵入中国洋面。最后一次，英舰于 7 月 21 日到达澳门洋面以防备法国侵占澳门为名，由少将度路利率兵 300 名，登陆澳门，占据炮台，后又驶入虎门，停泊黄埔。20 天后，度路利竟率官兵 200 余人到广州城外十三行停留，求见总督。陆续到达的英船共 19 艘，英人前后登陆 760 人。总督吴熊光调集官兵 2600 余名，分驻澳门、黄埔。并向英军再次发出警告：如再延迟撤出，不遵法度，不但停止开舱贸易，并当派大兵围捕。1808 年 11 月初，英军退去，吴熊光宣布开舱，恢复贸易。